



中国藏西夏文献研究专号

杜建录 主编

XI XIA XUE

西夏學

第二輯



宁夏人民出版社

西 夏 学

第二辑

杜建录 主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

二〇〇七年七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学. 第2辑 / 杜建录主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227-03536-7

I. 西… II. 杜… III. 中国 - 古代史 - 西夏(1038~1227) - 文集 IV. 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0581 号

西夏学 (第二辑)

杜建录 主编

责任编辑 王永亮 周淑芸 马明德

装帧设计 沈家菡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339 千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536-7/K·410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西夏学》编辑委员会

主任：陈育宁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天顺 牛达生 史金波 白 滨 李 蔚 李华瑞

汤晓芳 陈炳应 杜建录 张迎胜 罗矛昆 周伟洲

林英津 荒川 慎太郎 索罗宁 聂鸿音 韩小忙

主编：杜建录

编辑：彭向前 段玉泉 许伟伟

本期执行编辑：许伟伟



西夏文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插图 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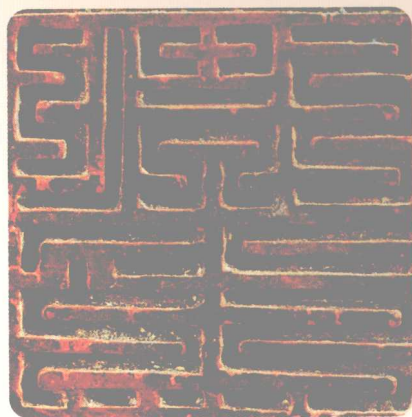
西夏文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三首页与封面 国家图书馆藏



西夏光定元宝 宁夏考古研究所藏



西夏首领印
宁夏博物馆藏



西夏文“内宿待命”铜牌 宁夏博物馆藏



西夏文残碑 宁夏博物馆藏

目 录

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里程碑（代序）·····	陈育宁	1
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新探·····	史金波	3
中国藏西夏文献概论·····	杜建录	17
中国藏西夏文献综述·····	史金波等	34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	史金波 白 滨	80
西夏文藏传续典《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源流、密意考述（上）·····	沈卫荣	92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华严经》卷 42 残片考·····	孙伯君	99
甘藏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释·····	段玉泉	102
中国藏西夏文《大智度论》卷第四考补·····	彭向前	110
中国藏西夏文《菩萨地持经》残卷九考补·····	杨志高	115
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残片补考·····	戴忠沛	120
内蒙古博物馆藏西夏文《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残片考·····	黄延军	125
西夏佛教著作《唐昌国师二十五问答》初探·····	索罗宁	127
西夏遗文录·····	聂鸿音	134
附图·····		167
书讯·····		179
稿约·····		180

Main Contents

A Milestone of Collating Research on Tangut Manuscripts	Chen Yuning (1)
A New Inquirement on Tangut Manuscripts in Chinese Collection	Shi Jinbo (3)
An Outline on Tangut Manuscripts in Chinese Collection	Du Jianlu (17)
A Survey of Tangut Manuscripts in Chinese Collection	Shi Jinbo et al.(34)
A Research on Colophons of Mogao Caves and Yulin Caves	Shi Jinbo and Bai Bin(80)
On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and Doctrinal Attribution of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i>Samputa tantra</i>	Shen Weirong(92)
A Study on the Tangut Fragments of the Volume 42 of <i>Avataṃsaka</i>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Sun Bojun(99)
A Research on the Tangut Manuscript of <i>Ārya-prajñāpāramitā-saṃcaya-gāthā</i> Preserved in Gansu	DuanYuquan(102)
A Com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n the Tangut Fragments of the Volume 4 of <i>Mahā-prajñāpāramitopadeśa</i> in Chinese Collection	Peng Xiangqian (110)
A Com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n the Tangut Fragments of the Volume 9 of <i>Bodhisattva-caryā-nirdeśa</i> in Chinese Collection	Yang Zhigao (115)
A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angut Fragments Discovered from the North Region of Dunhuang Mogao Caves	Tai Chung-pui(120)
A Complementary Decipherment on the Tangut Fragments of <i>Yuqie Jiyao Yankou Shishi</i> Preserved in the Museum of Inner Mongolia	Huang Yanjun (125)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angut Work <i>Twenty Fiv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n the Buddhist Principles Posed by the Monks before the State Preceptor Tangchang</i>	K. J Solonin (127)
A Compilation of Compositions during the Xixia Times	Nie Hongyin (134)
Plates	(167)
Book Messages	(179)
Notices to Contributors	(180)

(Revised by Peng Xiangqian)



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里程碑（代序）

陈育宁

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由宁夏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牵头，联合全国二十几个文博与学术单位整理编辑，任继愈、饶宗颐、李学勤、徐苹芳、樊锦诗任学术顾问，陈育宁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史金波、陈育宁任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1年，国家教育部批准“中国藏西夏文献整理出版计划”后，宁夏大学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积极组织研究力量，展开工作。2002年，项目组成员史金波等发表《国内西夏文献简明目录》。同年，杜建录等完成《国内藏西夏文献整理研究概况》。经过一年多摸底调查，基本搞清楚了国内西夏文献的收藏与研究情况。联合各地收藏单位和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一套中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影印本，这项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工程提到了日程上。但编纂出版这样的大型文献，除了要有大范围联合和合作外，巨额的投资是主要问题。2003年，有着丰富古籍整理经验的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愿意筹集资金共同编辑出版这一大型文献，并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签订了《联合整理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协议书》。随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甘肃省古籍整理编译中心又和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甘肃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武威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宁夏博物馆、宁夏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博物馆等十几家单位一一签订了联合整理协议。

2004年实质性的拍摄、扫描和整理编纂工作全面展开，2005年8月出版了北京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的前两册。2007年7月全书出齐。该书共分北京、宁夏、甘肃、内蒙古、陕西、金石等6编17卷，分装20巨册。北京编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卷、故宫博物院藏卷、北京大学藏卷；宁夏编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罗雪樵藏卷；甘肃编包括敦煌研究院藏卷、甘肃省博物馆藏卷、武威博物馆藏卷；内蒙古编为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卷、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额济纳旗文化馆综合藏卷；陕西编为西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金石编包括西夏陵残碑卷、碑刻题记卷，以及官印、符牌、钱币卷。

中国藏西夏文献编纂出版的意义重大：首先，它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境内收藏的西夏文献，在整个西夏文献整理出版与西夏学研究中，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其二，它是西夏文献整理研究中第一次真正把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攻关，这是本项目顺利完成的关键之一；第三，它是西夏文献整理研究中第一次通过市场运作筹集资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书陆续出版后，受到海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在2006年11月教育部召开的地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领导专门提名表扬了这一重大项目。

国内现存的一万余件西夏文献，分藏在全国各地，这对查找、搜集、使用这些文献带来了极大地困难。该书的出版，把分藏于各地的西夏文献汇集在一起，它的出版发行，大大便利了专家学者们使用。使非常有价值的西夏文献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利用，同时又是将中国藏西夏文献推向世界的重要手段，是一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事业。现存的西夏文献都是珍贵善本，出版后将大大降低原件的使用率，达到保护原本的

目的。

20世纪初,继俄国科兹洛夫之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也纷纷闯入过黑水城,攫取许多珍贵的西夏文献和文物。但这些目前收藏在国外的西夏文献,从整体上说,都无法与西夏故地中国所藏西夏文献相比。《中国藏西夏文献》所收的西夏文献相当丰富,有纸质文献,也有非纸质文献;有写本、刻本,也有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藏文。内容除大量佛经外,还包括辞书、字典、医方、占卜辞、日历、便条、请假条、欠款单、会款单、贷粮账、贷钱账、卖粮账、户籍文书、军抄装备文书、告牒、告状案、审案状等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藏西夏文献中独一无二的碑刻、题记文献,更是弥补了史籍的不足。“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有关“官作”的记载,是研究西夏经济关系的珍贵史料;有关“大夏”“大白高国”记载,是研究西夏国名的重要资料;夏、汉两种文字对照,则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西夏文字消亡数百年后,通过凉州“西夏碑”才得以重新认识。

唐五代宋初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是早期党项与夏州拓跋政权的真实记录,它解决了西夏王族拓跋部的族属问题,纠正了史籍中关于夏州拓跋李氏世袭关系的谬误。

刻于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西夏文石经幢,说明明代党项人仍然存在,西夏文也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河南省濮阳“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甘肃酒泉“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以及河北保定“大元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为我们提供了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的活动情况。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西夏文题记记录了王子、贵族、官吏、高僧及僧俗平民的姓名、官职和在莫高窟、榆林窟的宗教活动,提供了西夏国名、纪年、官制、封号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资料。

宁夏石坝发现的西夏文银碗,分别在碗底用西夏文写明其重量是“三两”和“三两半”,经实测,其重量是114克和137.5克,由此可知西夏“两”的单位值38~39.1克,与宋朝“两”的单位值39~40克相近,填补了西夏衡制研究的空白。

总之,大型系列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的出版必将在新世纪推动国际西夏学向前发展,并对相关学科,如中国中古时期的历史学、民族学、佛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学科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通讯地址: 宁夏大学 银川 750021)



中国藏西夏文文献新探

史金波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王朝(1038~1227年),正式立国前夕创制了记录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语言的文字,当时称为“蕃文”,后世称为西夏文。西夏文创制后在境内广泛使用。西夏文的创制和应用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西夏文随着西夏的灭亡而逐渐消亡,明、清以降成为无人可识的死文字。一百年前世上竟没有一本西夏文书籍。西夏这样一个重要王朝的历史并未列入中国“正史”之中,致使有关西夏的汉文史料十分贫乏。所幸近百年来西夏文文献不断出土,给西夏研究带来转机。

自20世纪初以来,先是俄国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于1908~1909年,率领探险队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发现了大批文献和文物。其中以西夏文文献最多,共有数千卷册。这些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献长期封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后来英国人斯坦因(A.Stein)、法国人伯希和(P.Pelliot)、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都自中国获得数量不等的西夏文文献。

其实国内珍藏的西夏文文献也很丰富。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掘获出两大坛西夏文文献,多数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少部分辗转传藏于故宫博物院、甘肃、宁夏,一部分流失于日本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的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武威小西沟岷和亥母洞,内蒙古的黑水城和绿城,宁夏的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方塔以及陕西、新疆等地又陆续发现和收藏不少西夏文献。这样全国所藏总计在万面以上,皆为珍贵古籍,多以善本入藏,是西夏研究的重要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引起专家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过去对国内所藏西夏文献,虽进行过整理,并编制目录,进行考释,但从未系统、全面刊布出版。因为这些文献分散各处,并深藏密库,国内外专家查找、利用十分不便。宁夏大学在2001年将编纂、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申报为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得到批准。2004年宁夏大学、国家图书馆、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等全国各地十几个部门,共同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以便利用这些文献弘扬学术,推动研究。

《中国藏西夏文献》系大型系列文献丛书,将分藏各地的西夏文文献制成清晰的图片出版,提供珍贵原始文献,同时对各地文献分别以“综述”介绍,对每一文献又有“叙录”记其形制、内容。该书分北京编、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陕西编、金石编。北京编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藏卷;宁夏编包括宁夏博物馆藏卷、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卷、罗雪樵藏卷;陕西编包括西安市文物局藏卷;甘肃编包括敦煌研究院藏卷、甘肃省博物馆和定西县文化馆藏卷、武威博物馆藏卷;内蒙古编包括内蒙古博物馆藏卷、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和额济纳旗文化馆藏卷;金石编包括西夏陵残碑卷、碑刻题记卷以及官印、符牌、钱币卷。^①

在笔者从事西夏研究的40多年中,对国内各地所藏西夏文文献大多数作过调查、整理和研究。在此

① 史金波,陈育宁总主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0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5~2006年。

次修复和出版过程中,笔者作为总主编之一,重新进行整理和研究,又有新的收获和体会,一些心得已经注入《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综述”和“叙录”中,但由于统一体例的限制,一些对文献的认识、研究又未能在书中得到反映,现择其部分分述于下。

一 元代曾在建康(南京)印刷西夏文佛经

蒙元时期西夏人称作河西人,为色目人一类,有相当高的民族地位,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元代尚使用西夏文,被称作河西字。过去知道元代曾在杭州刊印西夏文佛经。根据元平江路磧砂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发愿文记载:“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寺院,永远流通。”^①管主八原是西夏后裔,任松江府(今上海)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这一记载确切地印证了元代曾雕刻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其他单部佛经的事实。有元一代多次印刷西夏文大藏经。近年敦煌北区发现的西夏文刻本佛经残页《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经末有一长方形压捺印记,上有汉文两行:“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师利塔中永远流通供养。”^②此题款证实管主八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敦煌佛塔中。可能在他所施经中都押捺这样的印记。此外管主八对刊刻《普宁藏》《磧砂藏》也贡献很大。^③

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刻本《慈悲道场忏罪法》,存卷1、3、4、5、6、7、8、9、10,共9卷,缺卷2。经折装,原各卷皆有封面、题签,卷首皆有梁皇宝忏图一幅4面,现有的部分残损,图右有汉文“俞声刊”3字。后有佛名4面,卷前经名后有译者题名,译文为“天生全能禄蕃式法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救德主世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是为西夏惠宗母梁氏和惠宗的尊号。俞声是元代杭州地区刻工,曾为宋两浙茶盐司雕刊的《礼记正义》和杭州刻本《尔雅疏》补板。^④可证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的《梁皇宝忏图》为元代刊印。那么,此经是在哪里刻印的呢?

在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卷1序文最后一行下有西夏文双行小字刻款,每行11字,译文为“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⑤南宋和元代都曾设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但南宋与西夏各为王朝,西夏是从宋朝分裂出去而建立的国家,宋夏关系历来紧张,曾发生多次战争。宋朝不仅不承认西夏是独立王朝,还不承认其文字。双方战争中宋朝还以西夏文书作为战利品。康定初(1040年),宋大将仁福攻陷西夏白豹城“悉焚其伪署李太尉衙署、酒税务、粮仓、草场及民居室、四十里内禾稼,积聚诸将分破族帐四十一……虏牛、马、羊、橐驼七千余头,器械三百余事,印记六面,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⑥所谓“伪宣敕告身及蕃书五十通”应指西夏文字文献。西夏以西夏文上表,宋朝拒不接受。宋元丰元年(1078年)西夏使臣到宋朝,“以蕃书附之入谢”。“蕃书”即西夏文。宋接待官员赵戡收下谢表,宋神宗下诏毁书表,并令开封府治赵戡之罪。^⑦可见宋朝对西夏文的忌讳,从未见在宋朝境内刊印西夏文文献。因此宋朝不可能在建康府印西夏文佛经。

元代是大一统国家,西夏地区已成元朝的一部分,西夏党项后裔成为地位较高的色目人,西夏文为当时行用文字之一。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在大都北居庸关的通道上,修筑了一座著名的过街塔。在过

① 该卷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山西崇善寺和日本善福寺也入藏是经。

②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3期。第1~16页;《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148页。

③ 陈高华:《元代南方佛教略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2~324页。

④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83页。

⑤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册,第91页。

⑥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2,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中华书局,2004年。

街塔门洞内的高大石壁上,用6种文字镌刻了陀罗尼经,西夏文为其中一种,有77行。其余5种是汉文、梵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无独有偶,元代另一方有西夏文字的六体石刻,即莫高窟速来蛮西宁王的梵、藏、汉、西夏、蒙古、回鹘文的六字真言碑,建于至正八年(1348年)^①。这是元代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晚的西夏文字资料。笔者曾到甘肃省永昌县的西夏圣容寺附近考察,其山冈左侧河崖山石上也见以西夏文等上述6种文字镌刻的六字真言。^②这些石刻反映出元代多民族文化的典型特质,表现出党项人及其文化在元朝的地位,说明当时汉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都是国家认可的通用文字。

因此可以肯定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慈悲道场忏罪法》是在元代雕印。“此忏罪法出处地界者江南金陵建康府城中奉敕所集”,所谓“出处”“集”者,应为集结印刷出版之意。

此经高32.8厘米,宽13厘米,上下双栏,栏高27.9厘米,面5行,行15字。馆藏元代在杭州刊印的西夏文佛经多种,一般高33厘米,宽12.2厘米,上下双栏,栏高23.8厘米,面6行,行17字。此经栏高且行少,字体硕大,每字约2厘米见方,而杭州刻经字体较小,约在1.2厘米见方。两相对照可见版式的明显区别,这可作为不同时间刻经的佐证。

元代除杭州外还在建康译经,说明元代西夏文字和西夏文佛经的继续流行并不限于一时一地,当时不仅是因在杭州有党项人杨琏真伽这样炙手可热的释教总统能刊印佛经,在其他地方也有刊印佛经的可能,这对认识元代西夏文佛经的印制、流行有重要意义。

二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刊印地点

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蒙元时期刻本。存卷1至卷10共15卷,其中卷1、4、5、6、10有复本,缺卷2、7。

此经经折装,卷首有佛画4面,有的卷遗失;有画像记1或2面。卷1有忏悔灭罪记18面,面6行,行17字。流传序10面,面6行,行16字,题款译文为“兰山石台岩云谷慈恩众宫一行沙门慧觉集”。“兰山”即贺兰山。“慈恩众宫”即慈恩寺,是贺兰山中的一座寺庙。一行沙门慧觉是夏末元初的高僧,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的录传者,也是大夏国弘扬《华严经》诸师的最后一位。^③经题后校经题款译文为“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敕重校”。“仁尊圣德珠城皇帝”为西夏仁宗尊号。流传序记载了《金光明经》流传东土后先后五次由梵文译为汉文的经过,还特别记述了西夏时期翻译、校勘此经的经过以及在西夏倡导、传播此经的情况,“后始奉白高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番”。指出惠宗时由国师白智光从汉文译成西夏文。最后还提及西夏灭亡后此经的遭遇与序言作者的发愿。此经卷10末尾有刻印跋文及人名4面,跋文汉译文为:

今释迦圆寂,付法传而至于今时,佛法住盛荣者,以此经是。故大界国世界信众施主陈慧高,念此语故,发出大愿,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因此施舍净物,令雕新字,乙巳年八月十五日始起,丁未年中刻毕,净纸上得以印施。以此善根,上报四恩,下救八苦,德法重盛,佛事为新。慧高等十恶五罪孽令灭,三恶八灾苦极莫受。欲现最安生,而成佛道也。^④

跋文记载了刊印时间起自乙巳年,完成于丁未年,应是蒙古乃马真称制尚无年号的1245~1247年。^⑤跋文中的“大界国”即指疆界宽广的蒙古国,“世界”在西夏文中有二解,一是指时空意义的世界,二是指“朝廷”“京师”意。在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多种条文中“世界”二字是“京师”之意。这时的京师是否是蒙古的京师大都呢?大都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时(1215年)已被蒙古军占领,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方置版图,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成为中都,始为元朝首都,九年(1272年)改为大都。乃马真称制时,蒙古首都尚在开平,当时不可能在那里印刷西夏文佛经。因此这里的京师

①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9年,图118。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

③ (元)一行慧觉录:《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4。

④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册,第85页。

⑤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3期,第90~111页。

很可能是指西夏的旧都中兴府,即现在的银川市。跋文提到“番国旧印板国毁中失”,番国即指西夏,可能因在西夏故地,对西夏文《金光明经》在国家灭亡的战乱中损毁记忆犹新,并带有怀旧情感重新雕印此经。其主要发愿者陈慧高,似为一汉姓僧人,但在发愿人名中出现的人名中除部分汉姓外,还有很多党项人姓。如兀则慧刚、讹利慧德、折木氏三姐、酪布氏成舅、没西慧会、讹慧盛、讹二氏福德子、多氏导导、[移则布氏冬冬、契没朱迦鸠等。

三 国家图书馆藏泥活字版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分析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分上下两卷(编号3.15、3.16),皆是残本,因其断折严重,背面以其他废弃经纸裱糊。裱糊用纸不止一种,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51、71两卷,面高32.3厘米、宽12.1厘米,上下单栏,栏高26厘米,面6行,行17字。卷51仅存2面(编号3.15、3.16各1面),此外尚有两残纸。这些页面无任何经名、页码标志,系依据经文内容认定的。卷第71存44面,也分属3.15、3.16两个编号,因系裱糊用纸,裱贴混乱,经仔细核校经文,方理清顺序,并知所缺页面。有的页面未能从被裱糊页上揭开,将正面粘贴于被裱糊页后面,仅从背面看到反字。此卷按佛经内容将原图版顺序重新调整如下(方括弧内为图版原编号):3.15号的首2页、[24 25B](重复1行)、[22 23B]、(下缺1面)、[04 05](背面)、[34 35B](背面)、[24 25B](背面)、[38 39B]、[37B]、[36B]、[26 27B]、[28 29B]、[42 43B]、[40 41B]、[44 45B](下约缺30面),下接3.16号[38 39B](右2行)(下约缺6面)、[05 06B](左6行)、[03 04B]、[07 08B](左11行)、[05 06B](右9行)(下缺1面)、[17 B](右6行)、[11 12B](下缺2面)、[07 08](右4行)、[15 16B]、[13 14B](下约缺10面)、[25 26](左11行)、[23 24](下约缺10面)。完整经文约104面,此经存44面,约缺60面。

该经题后有译、校经题款,译文为“唐于闐三藏实叉难陀译,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皇帝御译”。题款下有朱色宝塔式梵文押捺印记。

又馆藏西夏文残页中还有泥活字本《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3的一面,存5行(1、5行仅存半行)。^①

原已知国家图书馆藏有西夏文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共63卷,其中有的有复本,不重复者52卷。这些佛经的活字本特点已有论列。但观《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背面裱糊的上述活字印本,与此63卷活字本相比较,则又有明显的不同。

观察这些文献的版面、字迹,具有泥活字印刷特征。其中很多字笔画中间断折,不少字有明显的笔画缺损痕迹,有的字边缘不整齐,有断残现象。仔细观察,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字有笔画断缺现象,这在木活字印刷品中是不会发生的。甚至有的字由于缺角而显得近于浑圆,有的笔画中有类似气泡、沙眼的痕迹,有的文字模糊,字的边缘形成蜡泪状,这是烧制活字时温度太高,造成的流釉现象所致。这些都体现了泥活字印刷的特点。

中国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②,这是印刷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然而中国早期活字印刷实物在中原地区都没有保存下来。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不久,西夏人便开始使用泥活字印刷,并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印刷。此前只知一种西夏文泥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此经内蒙古黑水城遗址和甘肃武威市亥母洞遗址都有出土,分别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武威市博物馆。

200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山嘴沟石窟发现大量西夏文献,其中有《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圆觉注之略疏》为活字印本,不仅从印面可见活字印刷的特征,前者还有印经题款,记录了参与印制该经的人名,同时披露了当时的分工,如校印面者、拣(选)印字者、做活字丁者、印本者,这就为该文献定为活字印本提供了确切依据。^③将宁夏山嘴沟石窟发现的《妙法莲华经集要义镜注》,与上述国家图书馆藏《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1、71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以及俄国和武威藏《维摩诘所说经》对比可知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40页。

②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8“技艺·板印书籍”条,中华书局,1962年。

③ 孙昌盛:《贺兰山山嘴沟石窟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步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为同类印刷品,证明这些文献都是活字印刷。国家图书馆藏3种泥活字版佛经是新发现的泥活字印刷品类,有重要文献和文物价值。

四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的时代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包括了西夏时期、蒙古时期和元代,先后至少有240年,在国内外保存西夏文献的部门中,西夏文献时间跨度最长。

馆藏有两页瓜州审案记录,是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1070年)瓜州(今甘肃省安西县)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笔录。这些稀见的文书对研究西夏早期的经济和法律很有价值。

馆藏有不少写本,其中以《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主,共21卷,皆是七八百年的古本,也十分珍贵。此应是西夏时期写经。

馆藏民国时期出土的西夏文献如上所述有蒙古乃马真时期刊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

元代刊印西夏文佛经事经过了一番周折。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对于作为民族文化重要标志的西夏文还有感情,仍在保留使用。元政府为笼络少数民族上层,对此也提供了条件。世祖时曾下令雕刊河西字藏经板,准备印刷西夏文大藏经。史书上对此没有更多的记载,估计与当时西夏后裔“河西人”有较高的地位、忽必烈崇信佛教有关。此外当时帝师八思巴的弟子河西僧杨琏真伽备受重用,他投靠、贿赂权臣桑哥,担任江南释教总统应与此关系极大。而雕刊地点正是在杨琏真伽任职的杭州。世祖刚刚去世,成宗继位后很快停止了雕刊西夏文大藏经,其原因史书也未记载。若分析当时的政局也可看出其中的端倪。世祖忽必烈后期桑哥被罢黜,杨琏真伽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财宝、戕人性命、盗诈钱财、掠夺田产等种种不法也被揭露,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追究其罪行,并抄没非法所敛财产。但忽必烈于第二年又给还其人口、土田,处分轻微。成宗即位后当年便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十一月“乙卯,令河西僧人依旧助役”。这是专门针对过去西夏僧不服劳役而作出的规定,透露出新帝对河西僧人的不满。两天后又下旨“丁巳,……罢宣政院所刻河西藏经板”。^①取消正在进行的雕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工作。可能考虑要把杨琏真伽以及少数不法河西僧人的恶行与整个被朝廷倚重的党项族分开,因此成宗不久又恢复了雕刊西夏文大藏经的工作,并于大德六年(1302年)完成。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武宗、仁宗又陆续印制,管理此事的党项上层有拥立武宗即位有功、仁宗时官为御史台侍御史的杨朵尔只等。^②元代刻印西夏文佛经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馆藏西夏文《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本母》卷5、《悲华经》卷9、《经律异相》卷15各有祝赞4面,祝赞中西夏文题款译文为“奉大元国天下一统世上独尊福智名德俱集当今皇帝圣寿万岁敕,印制一全大藏经流行,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太后皇后与天寿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使见千秋,印大藏经五十部流行”。知此三卷经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印制。又《妙法莲华经》有祝赞3面,其中题款译文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是元武宗和仁宗的母亲。知此经为武宗或仁宗时印制。馆藏元代西夏文佛经展示出元代刻印西夏文经的形制。又《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卷末有元皇庆元年(1312年)西夏文发愿文,版间接纸处有刻工名“台周”。西夏文《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的刻工中也有“台周”,尽管该经中没有记载刊印时间,也可推定与《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大致同时雕版。再有《金刚萨埵说频那夜迦天成就仪轨经》的刻工有“周子俊”,而《不空罽索神变真言经》中也有刻工“周子俊”,也可证两部经是同时代的刻本。

《菩萨地持经》卷9、《大智度论》卷4的版本形制与上述元代佛经相同,可定为元代版本。《妙法莲华经》虽与上述佛经版本有异,但卷首有祝赞3面,其中西夏文题款译文分别为“当今皇帝御印”,“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御印”,“正宫皇后御印”,而“仪天兴圣仁慈昭懿寿元皇太后”系元武宗和仁宗母亲,知此经也是元代印制。《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版式与《妙法莲华经》相同,也可推测为元代印制。

① 《元史》卷17《世祖纪十四》、卷18《成宗纪一》。

②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1期,第64~76页。

《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卷 15、《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下卷、《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卷与上述形制有所不同,是否杭州雕印有待进一步考证。^①

五 国家图书馆揭裱出的西夏文、汉文文献分析

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在修复馆藏西夏文文献时,于层层裱糊的封皮中揭出了一批西夏文和汉文残页。在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时,西夏文残页已随所在主文献分别刊布于各册,汉文部分则集中置于第 12 册国家图书馆藏卷的后面。^②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转来黑水城出土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封皮揭出的西夏文文献,无论是世俗文书还是宗教文献,都属西夏时期。其中少量汉文刻本佛经,不一定是宋代文献,也很可能是西夏文献。西夏王朝在使用西夏文的同时,也使用汉文;在刻印西夏文佛经的同时,也刊印汉文佛经。当然西夏也有宋朝和金朝刻印的佛经,例如黑水城出土的大批文献中就有宋朝和金朝的刻本文献。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中揭裱出的全部是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林世田教授等对汉文文献作了考证和定名。他们认为:一、灵武出土西夏文献护封中所出汉文文献均是明代刊写,这既为确认这部分西夏文献的刊刻年代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即这部分汉文文献是明代修补西夏文献时放入进去的,还是明代印制西夏文佛经时放入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有待于对每一部文献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二、这批汉文文献有很多可能是同一版本。说明这批西夏文佛经的装帧或修复大致是在同一时期。三、这些汉文文献可识别的均为佛道二教文献,而佛教文献又占绝大多数,特别是佛教仪式文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断定其为某个寺院的藏书,因残缺而成为“废弃物”,后被寺院或经坊用来制作或修补西夏文佛经的护封。四、这批文献中有一些未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多是在佛事活动中应用的仪式文书,这对研究明代西北地区的民间佛教具有重要意义。五、苏联政府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刘知远诸宫调》及其他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年代,与俄藏黑水城文献大致相当,除《刘知远诸宫调》为金代刻本外,其他均为宋代刻本,有的甚至能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找到相同的版本。^③这些认识很有见地,同时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既在各页面后有托裱,在封皮中又有衬纸。此经上下两卷经纸厚实,页面很少损伤,托裱的原因应是折面断开,以托裱的方式粘连各页面。但因托裱的纸张较薄,经常翻阅仍会在折叠处断开,日久不免前后错乱颠倒。此二经托裱用纸皆为西夏文佛经,从《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析出的有刻本《菩萨地持经》卷 9 共 6 面,刻本《大智度论》卷 4 共 8 面;从《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下卷析出的有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19 共 13 面,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48 共 6 面;从两经共同析出的有泥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51 共 4 面,泥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 71 共 44 面。

西夏文刻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上卷墨书汉文 4 行“发心表经释子李耳卜,上报四恩,下资三有,法界有情,同成正觉。师父李耳塞、母韦氏太平姐,舍纸王氏,亡过父李七什”。卷末裱纸上有西夏文墨书题款 4 行,译文为“师耳塞李,净信发愿者释子耳卜李(李慧胜),现在者韦氏,赐食者王氏,转身者李七什”。下卷裱纸上有两处西夏文墨书题款,皆 3 行,内容大体相同,一处译文为“净信发愿令经契全者耳卜李、现在发愿者纸此师母,赐食王氏,转身者父李七十”,另一处译文为“净信发愿令经契全者耳卜李、现在纸此者师母赐食王氏,转身父李七十”。这 4 条西夏文和汉文题款是同一人为同一事所书,系因佛经散乱而发愿裱经者所书,发愿裱经者名李耳卜,“耳卜”为西夏语音,译成汉文为“慧胜”,此人名李慧胜,西夏语称李耳卜或耳卜李,系一僧人。其父李七什,为转身者,即已亡故。李慧胜的师父是李慧净,西夏语称李耳塞,师母韦氏,名太平姐。汉文题款记舍纸王氏,而西夏文题款记施食王氏。两处西夏文题款记“纸此”,疑西夏文“此”字为“舍”字之误,此二字西夏文形近。书写题款的裱纸裱元代佛经,裱经时间当不是西夏时期,而可能是元代。推想当时在灵州尚有懂得西夏语文者,可以用西夏文、汉文书写题款,且所写西夏文行书字体熟练,但仍可见其有疏误之处,除上述将“舍”误写成“此”字外,在上

①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3~6 册。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2、12 册。

③ 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前言。

卷的西夏文题款中，“韦氏”“王氏”的氏字都没有写成姓氏的“氏”，然而在下卷“氏”字又写对了。这是否说明当时虽尚有用西夏文者，但有些生疏。

一方面《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托裱的衬纸中无一纸明代佛经；另一方面包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金光明最胜王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以及活字版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内的灵武出土佛经，封皮揭出的全是明代汉文佛经。这可否推论《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托裱和灵武很多佛经的修补封皮是两个时期完成的。《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托裱在元代，用的是西夏文旧经，当时还有懂得西夏语言和文字的人；而灵武很多佛经的修补封皮是在明代，用的是明代汉文旧经。明代是原建立西夏的党项族迅速走向消亡的时期，懂得西夏语和西夏文的党项人更加稀少。但从宁夏灵武所存西夏文佛经在明代仍能得到修复，特别是封面得以重新加固保护，可知当时当地对西夏文佛经仍然重视，或可推想当时还有少许懂得西夏文的西夏后裔。灵武是西夏故地，是西夏东部的重镇，这里的西夏后裔也随着历史延伸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西夏文佛经的修复或许是一个可以参考的例证。

六 故宫博物院藏西夏文文献的来龙去脉

1974年我在故宫博物院著名金石学家罗福颐老先生事先安排联系下，到故宫博物院看阅西夏文物和文献。当时除看到院藏的西夏文印、钱、牌等文物外，还看到西夏文《高王观世音》1卷，并被允许拍摄了局部照片。此后我和白滨教授发表论文《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初步介绍、研究了此经卷。^①

此次出版《中国藏西夏文献》之际，我重到故宫博物院联系出版文献事宜，在罗福颐先生公子罗随祖先生和古书画部傅红展先生的帮助下，不仅复制到已经介绍过的西夏文《高王观世音经》，还复制了过去未介绍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②

这两种西夏文文献，原为近代著名画家、篆刻家、文物收藏家徐宗浩（1900~1957年）收藏。徐先生字养吾，号石雪，祖籍江苏常州，久居北京，民国期间曾任北京古物陈列所顾问。1958年其家属将此两种文献捐献国家文物局，后调拨给故宫博物院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系1917年宁夏灵武县知事余鼎铭修城时，于城墙内所得西夏文文献之一种，其来源及其版本、价值已于国家图书馆卷综述中论及。^③国家图书馆也藏有木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4，但卷首无经图、祝赞牌，故宫所藏此卷则有经图一幅5面和空白祝赞牌1面。此卷末有北京广济寺主持现明所书后记，其开始称“己卯菊月二十三日无畏周居士携来广济寺，同观者江公字澄、埤公宝惠、杨公韵伯，欢喜赞叹，生希有心，宏慈退隐现明谨记”。现明法师（1880~1941）俗姓王，号永芝，湖南省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人。1916年为京中诸山长老推举为广济寺住持，1924年创设宏慈佛学院，退居潜修。他两次修造广济寺，九次传戒，办佛学院六班，为当时名僧。后记所书“己卯”年观西夏文经为1939年，在其创立宏慈佛学院、退隐15年后，时年60岁，故书“宏慈退隐现明谨记”。

所记周居士周肇祥（1880~1954年），字嵩灵，号养庵、无畏居士，又名退翁，浙江绍兴人，清举人，曾任山东盐运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署理湖南省省长，后任北京古物陈列所所长，晚年从事绘画，任东方绘画协会干事、委员，在北京主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该经册后附有周肇祥题跋2页，首记：“此西夏文佛经，出自宁夏，后入北京华古堂雨亭，为余收得。以《番汉合时掌中珠》及《西夏国书类编》考之，当为《华严经》卷74。华严法海，言博义深，遥荒小国，乃能译刊流布。”后引大德十年管主八在杭州印西夏文大藏经题记，并感慨：“西夏亡于南宋宝庆三年，大德初相距已七十余年，犹用其文字雕藏，何其文字之深固若是耶？”又简述西夏历史及文字创制使用史实，再记：“辽金元清皆外族入居中土，未闻以其国书译刊大藏，独西夏有此盛举，国亡之后犹能重刊印行，西夏虽亡而文字不亡，与元相终始，远至居庸关至正八年镌刻五国书陀罗尼，西夏文尚俨然在列，岂不伟哉！”最后记此经：“叠折稍有损断，仍复粘修

①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1期，第143~164页。

②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2册，第369~408页。

③ 《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册，第1~14页。